

真主与代治：一个伊斯兰教团体的生态实践与信仰表述

王正儒 敏俊卿

伊斯兰教认为，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实践不仅反映了穆斯林“认主独一”世界观的信仰过程，而且呈现了人类作为真主代治者的社会善功价值。本文通过呈现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的生态实践，试图阐释在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中真主、人、社区和自然之间复杂、多重的互惠关系。本文认为，穆斯林的生态实践不仅基于对真主的信仰表述，而且透过宗教仪式赋予其神圣性和文化意义，并产生实际的生态效应，展示出伊斯兰教“两世并重”的生命本质。

关键词：伊斯兰教 西道堂 生态实践 信仰表述

作者 王正儒，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研究员；敏俊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人类基于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种理论解释。这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和丰富的认知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研究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西方发端并得到迅速发展。1968年，美国学者维达（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首次提出了生态人类学这一词汇，并逐渐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在20世纪70—80年代，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规范和成熟期。这一时期，生态人类学研究也被引入我国，并开始相关的本土研究。

近年来，全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得到各国政府、学界和民间组织的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践纲领和发展目标之一，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哲学。这让人们认识到，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近代以来，工业化飞速发展而引发的单一问题，而且与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生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人类的主流哲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仅靠一些‘环保’行动是拯救不了人类的。”^①日本学者挂谷也指出，人的生活和文化具有多重性，必须注意其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他说：“生态人类学，今后发展的道路之一就是继续根据其研究成果，把价值观、世界观也划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从而说明生活、文化的多重性及其相互浸透性。”^②

宗教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信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纵观人类宗教，均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和谐思想，长期保持着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好传统。本文借用宗教与生态人类学的概念、范畴，用以阐述在伊斯兰教团体

① 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 [日]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载《民族译丛》，1987年6月30日。

的场景中，宗教信仰、文化理念与生态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总是处于动态性的状态之中。

西道堂是中国知名的伊斯兰教团体之一，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①之一，清末民初发祥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其组织模式在脉络上与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乌玛^②精神紧密关联，文化谱系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汉文译著活动集大成者刘智的学说^③形成呼应。它以经济和教育为依托，实践了长达50多年多民族穆斯林和睦相处、共同劳动、联合经营、平等消费的集体生活模式。由于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故引起广泛关注。时至今日，尽管西道堂穆斯林公社性质的“大家庭生活”在世俗层面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解体，但是，以伊斯兰教信仰和西道堂自身历史传统为核心认同的精神团体依然不失其原初的结构，即西道堂成员把为西道堂集体自身，或为社会、国家所做的任何善功，均视为实践“真主代治者”信条的基本途径。他们长期坚守的生态实践也反映了同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

一、临潭的文化地理与自然生态

临潭古称洮州。其县城的称谓，民间流行旧城的说法，藏语称为“哇哉”，是中国边地一个以回族为主的小镇。从甘肃省省会兰州出发，沿国道213线向西南方向行驶280多千米，便到达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这里是青藏高原和藏族文化的前沿地带，向西南继续延伸就直接进入其腹地；从这里向东南方向有一条省道313线，临潭县城地处于313线距合作市80千米的地方。在这条道路上行进的时候，就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它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的边界意义。道路以西是广袤的草原和游牧文化，东缘一线是大片的良田和农耕文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在这里划开了清晰的界限。临潭成为两大高原和多元文化交集的部分，藏、汉、回等14个民族群体同处其中。在名气上，洮州远不能与被誉为“中国小麦加”的河州^④相比。但是，它具有的多元文化和厚重的历史特色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宗教文化类型上，临潭呈现了多元宗教共存的文化景观。站在临潭县旧城制高点西凤山上俯视全城，该社区呈现出的最大人文特点便是多元宗教共存的生态景观。它几乎包含了各主要宗教和宗教内部各支系的历史遗存，反映了文化交流和竞相生长的盛景。全县现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等多种宗教类型。

① 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分别是：格底目、伊赫瓦尼和西道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年版，第282页。

② 乌玛（阿拉伯语，Umma، الأمة，原意为民众、民族，引申为群体、社团。公元622年，穆罕默德经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思索，总结经验，面对现实，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创建了一种融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宗教为一体的具有社会团体性质的伊斯兰宗教公社——“乌玛”。它破除了传统的仅仅以血缘、家族或部落为基础的单一联结方式，而以宗教信仰为核心，扩大联结范围，把所有穆斯林团结在“乌玛”内部，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

③ 刘智（约1660—1730年），字介廉，号一斋，南京人，为清初回族伊斯兰教著名学者、著作家。其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学者誉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集大成者，广大穆斯林尊奉为“先贤”，著书数百卷，《天方典礼》被收入乾隆时编纂之《四库全书》。刘智哲学思想是伊斯兰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交汇融合的结晶。刘智从宇宙观、认识论、人学理论等方面全方位地改造和吸纳“理学”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和思辨成果，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真宰造化一切”的宇宙观，“即物识主”、“率性修道”的认主修养说，“清心尽性”、“归根复命”的性命论，成功地实现了由经典伊斯兰教向中国伊斯兰的创造性转换，建构了中国伊斯兰哲学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冯怀信：《论刘智哲学思想对理学的吸收融合》，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2期。

④ 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南南部，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相邻。

临潭海拔在2209—3926米之间,土地总面积1557.68平方公里,其间山岭纵横,为高山丘陵地区,属于秦岭东西向构造中带中南部,中间高而南北低,地形复杂多变。其特殊的地形特征造成恶劣的气候条件。全县大部分气候属高寒干旱区,寒冷、阴湿、四季不分明,春秋两季总降水量为269.5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52%,降水的年变化是夏、秋两季降水多,冬、春两季降水少,因而易形成春末初干旱和秋季阴雨连绵,旱涝频繁,年平均气温3.2摄氏度,具有长冬无夏、冬季长达9个月,严寒期90多天,春秋相连、冬长冬冷而不寒、春季回暖慢、秋季降温快、冬干秋湿的高原气候特色。

旧城坐落于一个南北走向的山间狭窄盆地之中,但是,海拔依然高达2700米。其西向的西凤山、对坡山和东缘的东明山经过数十年的绿化逐渐形成了林地,其余山地均为开垦的农田,层峦叠嶂。旧城,除夏季被一抹诱人的绿色覆盖外,其他时间周边山体呈现一派荒芜景象。从自然环境看,旧城并不是一个拥有景致的城镇。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从旧城向四周逐渐扩展,就会发现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西倾山东麓黄河水系重要的支流——洮河在距离县城南端5公里的地方由西向东蜿蜒而下。它不仅滋润着洮河两岸的农业生产,而且培育了当地丰腴的林业资源,似一方美丽的绿宝石镶嵌在临潭这片贫瘠的土地之上,赋予这方时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当地著名的生态景观。这一生态景观将宗教元素、人类文化和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自然环境等富有意义地交融在一起,形成多元景致交相辉映的隐喻世界。在伊斯兰教的知识体系里,这一自然景观不再单纯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且还是造物主至尊、伟大、万能和超绝属性的间接体现。

二、西道堂的生态实践

一个世纪之前,伊斯兰教西道堂就形成于临潭这一多民族地区和多元文化氛围中,并处于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自然生态之中。在伊斯兰教的生命哲学中,今世和后世是相连接的,都需要得到重视,不管身处的环境恶劣或优越,都必须以今世的辛勤努力创造后世的永久幸福。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先生在引导各民族穆斯林过集体生活的初期就发出这样的号召:

尔众天民也,要知浮生之无常,而后世乃无朽,即当力撇今世,紧保后世。须知今世勤劳,乃后世之田园,后世乃今世之收获,所获即其所种,未有种善而得祸者,亦未有行恶而得福者,须知此一身,乃是两世的宝库,两世之美好,尽藏一身。

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

伊斯兰教“两世并重”的生命哲学思想与马启西倡导的积极务实的生活伦理完全吻合。基于此,西道堂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形成多元经营的经济结构,其中农业、商业和林业构成三大支柱产业。上文所述的洮河沿岸沟叉相连,树木茂密的林地便是西道堂当年发展林业的主要资源,也是他们体悟伊斯兰教“认主独一”世界观和实践“替主代治”信仰的重要场域之一。

据西道堂史料载,在西道堂第一代教长马启西(1857—1914)时代就购置了洮河沿岸的仓科林盘。当时,包括马启西的继任者——西道堂第二任教长丁全功(1868—1917)在内的数十名穆斯林肩负真主代治者的神圣使命从20世纪初就进入林海,与自然生态形成良好的互惠关系,履行管护林地和开发林业的天职。西道堂第三任教长马明仁(1896—1946)时期,又陆续购置鹿儿沟林、盘乔林、木多林、多松多林、贡去乎林、力池林、久尼林、他乍林、立家林、牙吉林、吉尼林等15座林盘。当时,西道堂林业资源横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碌曲、夏河、临潭、卓尼等县的广大区域,总面积达到7万余公顷。^①

① 敏生光主编《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第291页。

西道堂组织管理制度实行教长统一领导下的经理责任制，在其之下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负责领导和协调大家庭总务，各农庄、牧场、林场、商号、商队等部门，各分支机构又设经理负责本部门的具体事宜。其林业的管理也同样实行西道堂集体所有制下的经理负责制，每个林场均委派一名能力出众、信仰虔诚的经理。他们不仅需要对自己承担的世俗事务负责，而且更需要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负责，即世俗事务的恪尽职守与宗教信仰的躬践力行有机地交融在一起。

1938年6月8日，以认识西北社会基本问题^①为目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陪同考察的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王树民先生受邀来到西道堂。他们在西道堂先后待了9天时间，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西道堂各方面人士。王树民对西道堂组织机构的运作模式有一段完整的记录：

道堂如一独立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生息活动于其中，均为组成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后目的地。兹就事实及别所闻者略予推论，其原则似颇可以“理想社会之模型”拟之^②。

王树民的描绘和概括，让我们不仅看到了西道堂动态的历史，而且为我们阐释西道堂成员生态实践等社会行动背后的深层动因提供了重要参照。西道堂垂直向下的经理负责制看似与现代科层制相像，但是，所不一样的，在宗教的场域里，所有参与分工的成员其目标指向不是世俗层面的功用、效率，而是赋予了信仰的内涵，直指“认主独一”的世界观和“为主道奋斗”的生命观。正如拉帕波特注意到的：“自然通过一种信仰、知识和意志的过滤器而被人所了解……”^③

在林区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维护生态环境的考量，西道堂人所用的生活燃料均为生态系统中自然淘汰的枯枝残桩，任何砍伐活树用于生活燃料的行为是被严格禁止和受到惩罚的。同时，林区内禁止捕猎动物和滥挖药材，更不主张垦荒种田，因为他们的生活消费品无需直接向大自然获取，而是来自西道堂集体所有制下其他经济部门的长期补给。在他们眼里，与其相伴的动植物是真主要求人类珍爱的环境和善待的生命，是与人类相依为命的存在。正如伊里亚德（Eliade）在有关圣地的研究中所说：“对宗教信仰徒来说，空间不是单一的……这种空间的非均匀性也在一种对照的体验中表现出来，这种对照存在于神圣空间与其他空间之间，在其四周围绕的是无形的广阔与浩瀚。”^④ 这与我们对伊斯兰教场景中生态观的理解存在着关联性，自然生态象征着真主的超凡性，是真主永恒、不朽和极致的隐喻。

伊斯兰教并非主张人无求于自然，而是鼓励人们合理地开发，以享受真主的恩赐。《古兰经》云：“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2：22）“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16：5）“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与葡萄和苜蓿，与橄榄和海枣，与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以供你们和你们的牲畜享受”（80：24—32）基于这样的思想引导，以及处于保证林木再生与壮大的基本需要，西道堂采用间伐的方式，将木材用于建筑教育文化等社会公益项目中，形成生态维护与社区效益的良性连接，体现了生态实践的社会善功价值。如民国时期，西道堂利用科学采伐的木材建设了自己开办的临潭普慈小学（1919年）、临潭县立旧城第二小学（1935）、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校（1942年）和启西中学（1949年），同时，在20世纪40年代，西道堂先后支援木材建设了临潭的敏家咀小学、太平寨小学、岷县城内第一小学、兰州西北中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等。

①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② 王树民：《西道堂——新社会模型》，载《西北世纪》1949年第4卷第8期。

③ 转引自郁丹：《在神的怀抱里：一个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显圣景观》，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Eliade, Mircea. 1959.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p20.

1950年代,西道堂原有的林业资源被纳入国家的管理体制内,成为洮河林业局的重点林区。国家对其采伐40余年,至今依然发挥着良好的生态效益。失去了林业管护的权利,西道堂林业从业人员和家属陆续离开自己珍爱的自然环境回到临潭中心地——旧城。然而,他们从操旧业,成立植树造林小组,在荒芜的旧城社区义务开展植树造林。据当地老人回忆,临潭县县城所在地旧城南郊的下树滩和西凤山在“文革”初期全是西道堂人再造的大片林地。遭遇“文革”后,临潭旧城的林地无一幸免,全部被毁。1980年代,西道堂人不失其生态实践的历史传统,肩负起“替主代治”的神圣使命,承包西凤山,坚持每年义务种植松树、杨树等树种30余万株。30多年后的今天,西道堂在西凤山上的绿化面积达300多亩,绿化带形成水土保持涵养林,成为旧城一道重要的绿色屏障和自然景致。

三、代治观下的信仰表述

伊斯兰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认为真主是创造万物的本原,是生命的起点和归宿。它创造的自然万物,日月星辰,构成协调有序、相互依存、生机盎然的意义世界。人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者,要处理好人与真主、人与社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多重互惠关系,走健康持续发展之路。《古兰经》指出:“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2:30),“我以你们为大地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们这样工作”(10:14)。“代治观”确立了真主、人、社区与自然之间的等级体系和和谐秩序。

笔者在西道堂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主道”一词几乎是所有成员长期持守和广泛实践的关键语汇之一和核心人生目标指向。伊斯兰教系统中,六大信仰(伊玛尼)、五项宗教义务(伊巴达特)和社会善行(伊赫桑)构成三大支柱,三者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信仰确立穆斯林的世界观,宗教义务和善行是践行世界观的基本通道。所不同的是,宗教义务的履行更多地体现信仰者的个体行为,而善行则呈现了信仰社会化的过程,二者互相渗透,共同推动穆斯林将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生活实践融入充满宗教神圣性的世界之中。所以,在西道堂这个集体性的意义空间中,其成员始终以社会善行营造着“为主道奋斗”的氛围。笔者将此概括为“主道观”。

前文提及,在西道堂的传统中,生态实践自其创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人们将宗教和文化的意义投射在生态环境之中,即西道堂成员接受林业管护和开发的使命后,自觉地将其作为“为主道奋斗”的事业,乐意奉献一生,甚至几代人。他们举家迁徙,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于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直到今天,洮河沿岸的合作市帕乔村、卓尼县入吾村和临潭县拉扎河口,还居住着当年守护林业者的后裔,有些还形成村落。他们热爱真主创造的一草一木,对大自然赋予深厚的感情,自然景观在他们内心是参悟世界本质的意义景观,构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一种情感和意义的联结。伊斯兰教对于大自然的理解与藏地的自然观迥然不同。伊斯兰教认为,自然界只是真主的被造物,任它再奇异和美妙,也只是体现了真主的神性,而非真主本身。藏地的自然观则刚好相反,认为被视为神物的自然景观不再是物理的实体,而是神灵本身。《古兰经》指出:“难道他们没有仰观天体吗?我是怎样建造它,点缀它,使它没有缺陷的?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每个归依的仆人。”(50:6—8)就是说,对穆斯林而言,大自然的气象万千和动态变化只是认知真主超越性的媒介。所以,在西道堂成员中,对刘智关于反映伊斯兰教认识论的一段精辟论述可谓是耳熟能详:

今夫见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风,睹绿翠之萌动而知有春,视己身之灵明而知有性,参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①

^① (清)刘智:《天方典礼·识认篇》。

笔者在西道堂调查时，很多人对此能脱口而出。他们以此向笔者解释其生态实践和信仰表述之间的紧密关联。

进入茫茫的林海，林地既是西道堂人栖居的场所，也是创造财富和履行宗教功课的神圣空间，物化的自然赋予了文化的意义和宗教的内涵。以西道堂林业资源最丰富的鹿儿沟林为例，其从洮河向南纵深二十多公里，弯连弯，岭接岭，有“九沟十八岔，二十四个簸箕弯”之说。其中蕴藏的林木主要有松、柏、杉、红桦、白桦、铁桦、棉柳、红心柳和枇杷、毛竹等；繁衍栖息动物有鹿、獐、水獭、麝、狐狸、野鸡、兰马鸡等各种林鸟及野生动物；生长的野生药材和山珍野菜有当参、贝母、大黄、秦艽、黄芪、红芪、香草和羊肚菌、木耳、蘑菇、蕨菜、柳花菜等。^①在西道堂人的知识视野中，自然界的多彩品格与多样特性不仅仅是获得感官的审美享受，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信仰的透镜以此感知造物主的伟大与超绝，确认人在自然生态面前的角色与职责。

在伊斯兰教看来，真主创造人，给人以智慧、德性，赋予人以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功能，让人受用万物，目的是为了让人去感知、观察、认识世界的一切事物，进而从天地万物的实有及其发展规律中来认识造物主的独一和大能。这反映了伊斯兰教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对应，以及真主、人、社区、自然之间的互动与联通。

我们看到，真主、人和自然生态交织在一起。在这一场景里，人的生态情结，不仅仅是处于自然环境物质性的审美享受，人将自己沉湎于“替主代治”的神圣和愉悦之感中，更为重要的是真主、人与自然生态构成一种整体关系，三者处于和谐的状态和有序的等级秩序之中。

郁丹（Dan Smyer Yu）在研究藏地生态景观时提出地景与心景有情互动的概念。他认为，“心景指知识体系，将文化和精神的意义赋予到自然的景观中。反过来，当自然的景观因文化意义而被赋予生命时，它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并与人的行为发生互动。”^②在这点上，“景观——无论是宏观的宇宙，还是当地的地形——都是被形塑的，当我们对它进行感知时，是以我们的心景来进行的。”^③对应这一论述，在西道堂人的眼中，自然的空間总是以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世界予以呈现，宗教信仰与生态实践相互对应。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宗教信仰，物质的自然环境成为精神认知世界的中介。毫无疑问，穆斯林的生态观由信仰和文化的独特意义所形塑。

西道堂人为自己所维护的自然空间附着神圣性时，往往伴以规模不等的“尔曼里”^④仪式。仪式之于生态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自然观照和认识之中。仪式涉及内在的社会结构和心灵世界。它给社会成员以信心，规范他们的社会行为，赋予其行动以宗教的神圣性。

在西北穆斯林社会，尔曼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仪式，透过它，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和认同得以表达，分类意识得以发展和扩散。农历五月十九、二月初二、二月初七、十一月十五日西道堂人时间制度中几个极为重要的日子。这几个日子分别是西道堂历任教长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和敏志道的忌日。在这些日子里，一般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集体性尔曼里。其中，马启西

① 丁谦：《试析解放前西道堂的林业经济》，载敏生光主编《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第二卷），第322页。

② 郁丹：《在神的怀抱里：一个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显圣景观》，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Kedar, Benjamin Z. and R. J. Zwi Werblowsky. 1998. *Sacred space: Shrine, City, Land*. London: MacMillan. p. 10

④ 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善行、善事、善举。引申为伊斯兰教功修和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事业和行为。广义上包括一切有利于社会群体的慈善事业和行为。随着苏非主义的传入，西北地区回族伊斯兰教的门宦形成后，尔麦里引申为一种特殊的功修形式。在功修中，穆斯林们用特定的音调念颂《古兰经》、赞美先知穆罕默德，并围桌跪圈，为亡人祈求恕饶，为活人祈求平安。清真寺、道堂、拱北以及穆斯林家庭都可以成为过尔麦里的场所。一般逢宗教节日、先知的生辰忌日、苏非门宦的导师及亡人忌日，或为活人祈求平安都要举办尔麦里，称为“干尔麦里”或“过尔麦里”。

教长的忌日最为重视,它构成了西道堂集体仪式的核心,呈现出其与西道堂集体和个体生命意义的紧密关联。在尔曼里上,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不平凡的坎坷经历、人格魅力和伟大的宗教思想和实践总是被重新复活,并加以强化和符合时代的重新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指向是西道堂的未来。

据笔者所知,西道堂人在林地宗教仪式的举行除管护者以家庭为单元的方式之外,有时在重要的日子内以西道堂集体的形式举行。2011年6月13日,笔者就亲历了西道堂在临潭鹿儿沟林地内举行的“纪念马启西先贤归真九十七周年”的集体性尔曼里。参加仪式的人多达5000余人。正如此次尔曼里的举行一样,仪式的实际指向往往是为纪念西道堂已故的宗教领袖或家庭成员,但是,由于仪式在林地内的举办自然地赋予其神圣特性和文化意义,并以信仰的力量直接指引着守护者善待仪式地自然空间和动植物生命的思想与行为,从而产生切实的生态效应。

自然的景观通过仪式被赋予宗教和文化的意义后,成为人精神和心理景观的内在部分,以一种文化的健康影响着另一种生态的健康。根据伊斯兰教的生态观,自然生态系统因显现真主造化万物的神性而具有神圣性,但是,并不神秘,因为它仅仅是人与动植物和谐相处的物理空间,是认识本体的通道,并非是人、自然生灵与神灵共处的世界。

四、结 论

日本学者绫部恒雄提出,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及其进化的一门学科。它既研究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还研究这种相互关系产生的影响和被影响的文化(观念)体系间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①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说,认识到环境和文化不可分离,它们相互定义对方,两者处于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②

本文通过聚焦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的生态实践,阐释了在伊斯兰教信仰体系内真主与人之间的垂直等级秩序,以及人肩负真主代治者使命而形成的其与社区和自然之间横向的互惠关系。伊斯兰教认为,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实践不仅反映了穆斯林“认主独一”世界观的信仰过程,而且呈现了人类作为真主代治者的社会善功价值。穆斯林的生态实践不仅基于对真主的信仰表述,而且透过宗教仪式赋予其神圣性和文化意义,并产生实际的生态效应,展示出伊斯兰教“两世并重”的生命本质。在心景和地景相互交汇和影响的关系中,宗教和文化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使伊斯兰教生态和谐的思想,通过表述信仰的方式转换成健康的生态实践,维持起一个个良好的生态景观。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② 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